

刘仰月的早期革命活动



刘仰月（1903—1984），原巨野县探花刘楼村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排长、国民政府警卫连长。1927年4月在武汉军政学校学习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的派遣，到曹州开展农民运动。10月，建立中共曹州支部，刘仰月任支委。1928年春，中共曹州支部遭到破坏，刘仰月被迫转移外地继续工作。1984年病逝。

刘仰月，原名刘性印，1903年出生于原巨野县探花刘楼村，7岁时父母双亡，外祖母将他抚养成人。他自幼随五舅父读书，后又到曹州南华小学读书。1922年升入南华中学。

南华中学当时的校长曹兰珍（字香谷，鄆城县人）先生，思想较进步。在他任校长期间（1922—1926），办起了“南华书报介绍社”，把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地出版的进步报刊，介绍给广大青年。在这里，共产党机关报《向导》以及周恩来、陈独秀分别主编的《觉悟》《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都是青年们喜闻乐见的书籍。刘仰月读得废寝忘食，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在校期间曾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踊跃参加列宁和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积极参加反对军阀张宗昌的游行示威活动。

1925年夏天，刘仰月获悉，黄埔军校在开封市旗独街31号设有办事处，秘密招收进步青年入学。他和谷庆春（字树藩，定陶县城北东谷庄人）、史瑞祥（曹县东关郝家店屯电人）等毅然弃学从军，投考黄埔军校。经考核，被黄埔军校录取。刘仰月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一团四连受训三个月。后经正式考核编入第四期二团一连。在军校期间，刘仰月加入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周恩来具体领导，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的左派组织）。

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由广州出师北伐，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提前毕业，奔赴北伐前线。刘仰月被派遣到国民革命军新编一师第一团九连任见习排长，后升任特务连连长。在赣州集训时，国民党右派倪弼（新一师党代表）奉蒋介石密令，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激起了一师革命军人的强烈愤慨，把倪弼痛打了一顿。大家强烈要求查办杀人凶手。蒋介石趁机将革命力量占优势的新一师强行遣散。

在军校学习期间，刘仰月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进一步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新一师解散后，他决心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找政治部主任恽代英（当时为中共负责人之一）。

在武汉分校，恽代英经常对刘仰月进行革命教育，使他的思想觉悟和境界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求。此时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一面高喊革命口号，欺骗革命群众，一面暗中纠集反革命势力，准备绞杀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恽代英和共产党员丰复生，经过对刘仰月的考察，于

1927年4月初，在武汉分校介绍刘仰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恽代英把他分配到志愿兵团筹备团当筹备员，并任国民政府警卫团第四连连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也蠢蠢欲动，危机日益加深。7月，刘仰月奉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丁君羊之命，组成曹州农运工作组。以徐鹏翥和他为首的一行6人，于7月底返回鲁西南从事农运工作。到曹州后，他们住在省立六中南院。

1927年8、9月间，他与徐鹏翥先后介绍郑尔拙、丁培之、李道一加入共产党。农运工作组已由2名党员发展到5名党员和10余名团员。他们经过几次秘密酝酿，于这年10月，在六中前院正式成立了中共曹州党支部，刘仰月任支部委员。

为了扩大影响，深入农村组织群众，支部决定，工作组分散到菏泽、曹县、巨野、成武、定陶等县活动。刘仰月在菏泽开展工作。其间，他接受田位东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先后介绍毕儒英、宋心田入党，介绍王允健、孙广涵、赵清萍、宋宝贞等十余名青年加入共青团。

1928年春，国民党在曹属各县建立了党部。中共曹州支部的处境日趋恶化。党员们

只好在更加隐蔽的条件下工作。

有一次，刘仰月正在菏泽城内活动时被敌人发现。国民党菏泽县党部成员李公安，带领手枪队去逮捕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仰月在国民党员党部的朋友抢先给他报了信，刘仰月得以躲藏起来，幸免于难。刘仰月在共青团员王允健的岳父家里（原宋隅首南路路西）隐蔽了3天。敌人就把他的四舅抓了起来。他得知后，给敌人写了一封警告信，说：如果你们杀我们一口人，我就要杀死你们全家。结果，迫使敌人不得不把他四舅释放回来。

三天之后，刘仰月带着20元钱，星夜逃出菏泽，到定陶县常岗集找到了共产党员李道一。他们又到曹县找到郑尔拙、丁培之等，召开了紧急会议，共同研究应付时局的对策。经研究决定：郑尔拙和徐鹏翥留下来坚持工作；刘仰月、丁培之、李道一到郑州找李道一的内弟姚子庄（姚是国民党西北军第二方面军军法处主任），以谋暂时出路。

自此，刘仰月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他为曹州支部的建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此，党在鲁西南地区开始了漫长、曲折的斗争历史。

田浩存
（材料提供：中共菏泽市委党史研究院）

任守钧和他的革命之家



今年是山东“四五”烈士牺牲90周年。为进一步了解“四五”烈士之一的任守钧的事迹，我们走访了任守钧侄媳、任子健儿媳王翠兰。在和王翠兰老人的交谈中，她数次声泪俱下，为我们讲述了这个革命家庭至今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任守钧心系大众，慷慨献身革命

任守钧出生于1910年，是家中长子，成绩优异，后因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辍学投奔山西原籍的堂叔后备受欺凌，历经千辛万苦返回曹县后，任守钧一边赚钱养家，一边想方设法阅读各种进步书籍，立志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据王翠兰老人回忆，常听老一辈的人讲，任守钧那时就经常对家里人讲，穷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到时候我们都要参与到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去。他的言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父母和兄弟姐妹。

1928年2月，国民革命军吉鸿昌部攻克曹县城。任守钧联合一些有志青年，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城内大街张贴标语，游行示威。1929年，任守钧加入国民党开办的“党化教育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曹县青年会工作。青年会所谓的党化教育，实质上是进行结党营私的专门训练。任守钧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改造中国社会，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可寄希望于国民党，必须寻找新出路。青年会取消后，任守钧到曹县民众教育馆通俗讲演所当起了讲演员。在此期间结识了共产党员孔庆嘉，在他的引导下，任守钧深入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懂得了阶级斗争的革命道理，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这年冬天，任守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讲堂当阵地，把革命道理渗透在讲稿之中，在听众之间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任守钧、孔庆嘉非常重视知识青年这个群体，把县城新开办的曙光书店作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积极参与书店经营，不断购进革命书籍，供青年人购买、借阅。他还和孔庆嘉发起组织了“曹县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十余人，秘密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刊，探求真理。1931年1月18日，由于武装暴动计划泄密，任守钧、孔庆嘉被捕，被关押在曹县监狱，敌人妄想从他们口中搞清曹县的地下组织情况和活动计划，对他们威逼利诱，用尽各种酷刑，终未得逞。随后将任、孔二人押送到济南第一监狱。任守钧在狱中受尽各种非人折磨，对组织的秘密只字未吐。1931年4月5日，任守钧在济南慷慨就义，年仅21岁。

三兄弟前仆后继，接续参加革命

任守钧牺牲的消息传到家乡曹县，父母兄弟悲痛欲绝。二弟任子健中学毕业后到曹县第二初级小学任教，时刻不忘哥哥的革命熏陶，不断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放下教鞭，专心革命事业。任子健在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曹县县委组织部部长，不久调任中共单县县委书记。在一个雨夜，任子健回来和父母妻儿告别，要奔赴湖西革命根据地，当时已入冬，任子健仍是单衣单裤。在母亲和妻子的强留之下，他在家待了一个晚上。母亲和妻子连夜用两条裤子中间加垫棉絮为他赶制了一条薄棉裤，第二天黎明时分，任子健急忙奔赴单县。1942年12月21日，任子健在调任中共巨南五县委书记前夕遭遇日军包围，突围时和湖西专署专员李贞乾先后中弹牺牲。

任子健牺牲后，任家尚有排行第四的任守钊和排行第五的任子珍两个儿子。两个弟弟受哥哥影响颇深，一心想投身革命事业。任子健牺牲时，任守钊已订婚，妻子娘家担心他像兄长一样参加革命，提出必须入赘，否则就不同意这门婚事。任守钊结婚后，妻子娘家人更是严加看管，杜绝了他参加革命的机会。老五任子珍则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任子珍加入冀鲁豫南下支队，随二野五兵团西进贵州。解放后调至毕节专区工作，先后任毕节专区贸易公司营业部主任等职。当时的毕节专区因道路不畅等原因制约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困苦，缺盐少布。任子珍响应中央政策，积极开展城乡农副产品交流推销，组织棉纱、盐巴等商品外调流通，尽己所能改善毕节

专区经济和人民生活。后因工作需要调至黔西，任黔西财委会副主任兼税务局长。1956年6月调任毕节商业局副局长。1961年9月至1985年12月先后任金沙县商业局副局长、金沙县贸易办公室副主任、金沙县政协副主席等职。虽积劳成疾，他一直坚守工作岗位。1991年，任子珍在金沙病逝。

一家人饱受苦难，痴心支持革命

清朝末年，风雨飘摇，生灵涂炭，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任父任希贤是山西孝义县人，12岁时父母双亡，跟随舅父来到山东曹县谋生，在曹县南大街韩家酒店做学徒。同时做学徒的有三四个男孩，任希贤每天早起打扫卫生、整理店铺，因怕别人抢了先，经常在睡前将扫帚偷偷枕在头下。任希贤工作勤奋，聪明好学，深得主家信任，成为账房先生，后来更被聘为酒店掌柜。任家家境渐渐好转，五男一女六个孩子（三子夭折）相继出生。任守钧聪明伶俐，深得父母宠爱，被送学校上学，成绩总是全班第一。父母对任守钧寄予厚望，希望他谋得一份好的职业，分担家庭责任。

1928年2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曹县，革命思潮席卷县城。18岁的任守钧整天不归家，到处“空谈”一些道理，父母为此忧心忡忡。有一天，任守钧与家人谈起，苏联有个列宁，干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我们就是要学习苏联、学习列宁，救苦救大众出水火。他常常给弟弟、妹妹讲述苦难家史、国史，认识明白穷人受苦的原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培养革命感情。

参加革命，给家庭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无尽的恐怖和苦难。1931年1月，任守钧被捕，是任家一次次苦难的开端。因是“赤色分子”家属，任希贤夫妻二人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直到任守钧被押往济南才让回家。

任子健参加革命后，日伪渐渐得知其加入共产党，并成为地方领导人。任家住在县城南门里，可谓日伪眼皮底下，凡有劳差，总是第一个承担；一有风吹草动，任家老少就被抓进牢房。任家更成为一些势利的街坊邻居欺负的对象。“妓女‘王八’都比咱家‘光棍’！”王翠兰老人讲到这里，号啕大哭起来……

王翠兰老人讲到任希贤夫妇思想的转变过程。有一次，任希贤夫妇抓进了监牢。因为离家近，邻居将小米粥用瓦罐送进狱中。同牢房的七八个年轻的“共党分子”，在狱中也没得吃、没得喝，但是大家相互鼓励，毫无丧气之语。任希贤将粥分给他们吃，他们不忍心自己多吃那么一点，只是用食指在粥上抹一下，就这样大家轮流着把粥吃完。一天凌晨，这些年轻人被带出狱，全部遇难。这次经历让任希贤夫妇触动颇深，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冒着家破人亡的风险为革命事业前赴后继？都

说是为穷人打天下，如果穷人再不支持，这个天下该怎么打。想到这里，他们由衷地为儿子的事业感到自豪和骄傲。即使在两个儿子相继牺牲之后，老两口继续支持五子任子珍参加革命，尽其所能地为革命事业提供支持。

任子健的单县县委书记身份暴露后，妻子韩念芳和幼子任广文无法在曹县城生存。任希贤安排一辆独轮车，请一名劳力，将韩念芳母子送往单县。任子健他们在单县并无固定驻地，韩念芳三人白天走路，夜晚露宿村头，饿了沿途要口饭吃，直到一天遇到八路军的队伍，他们才找到任子健。任子健把韩念芳母子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因公务繁忙，一家人一个月也见不上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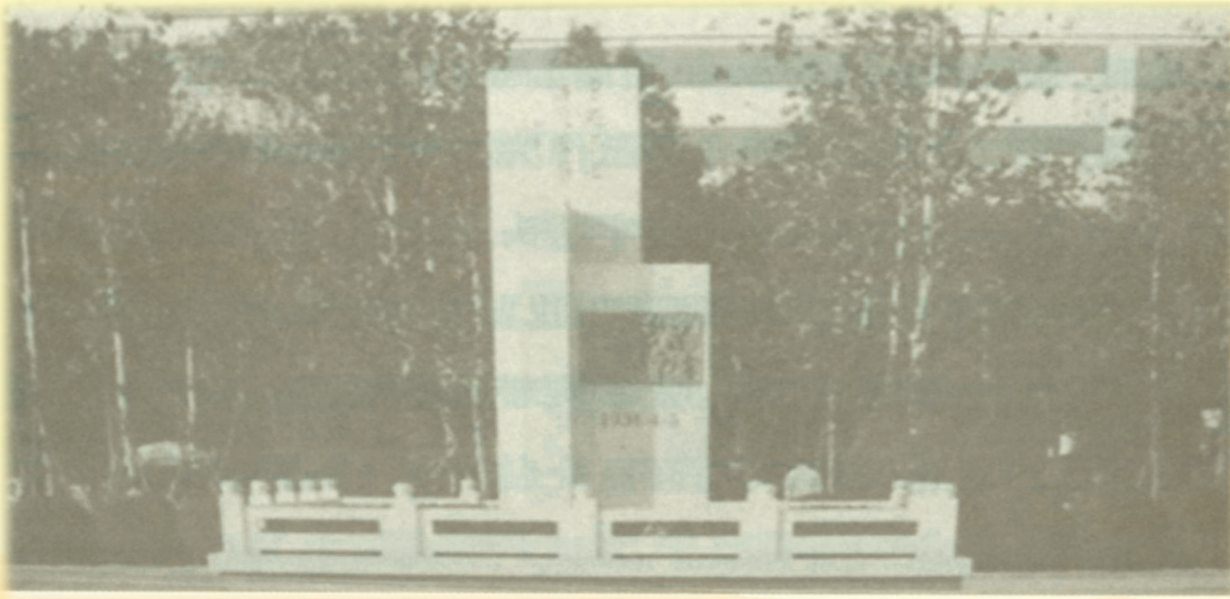
1942年12月，任子健牺牲时年仅27岁。当时，儿子任广文只有5岁，女儿还未出生。任子健牺牲后，老乡们对韩念芳母子依然不离不弃、关心有加。女儿出生后，有共党家属在村内的消息不幸传出。房东和邻居们经受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组织上担心万一发生不测，安排人员将他们三人送回曹县。此时，母子三人在曹县城仍无立足之地，无奈之下，只好躲往曹县城西刘集村任守钧、任子健的姥姥家，以要饭为生。

解放战争期间的一天夜里，刘邓大军的战士来到家里，让人担任向导。韩念芳坦承自己革命家属身份，把年幼子女撤在家里，带领队伍及时到达目的地，然后孤身一人连夜返回家中。王翠兰老人感慨说，兵荒马乱年代，婆婆这样一个年轻寡妇，深夜几十里奔波，是人民群众的何等勇气，是与人民队伍的何等深厚感情。其后的日子，韩念芳积极参加做军鞋等支前工作，为路过的人民队伍尽其所能提供帮助。新中国成立后，韩念芳当选第一届山东省人大代表。

王翠兰老人说，她与韩念芳虽为婆媳，却情同母女。王翠兰出身贫穷，打小与任广文订婚。解放后，韩念芳带子女回城。婆婆韩念芳思想开明，接王翠兰到家中一同生活，还让她到南门里小学上学。王翠兰老人说，解放后，任家的生活是平淡幸福的，作为烈士家属，任家受到政府很好的关照，任子健的两个子女任广文、任广林先后上了大学，成为国家干部。可是，革命年代的种种遭遇在任家留下太深的烙印。一到逢年过节，别的人家是团团圆圆、喜气融融，而他们任家，想起过去的苦难和失去的亲人，却总是一片悲戚和哭声。

王翠兰老人还说，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要忘记先辈们、烈士们奋斗的初心，希望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珍惜这个时代，大家一起努力工作，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张荣昌 朱青
（材料提供：中共曹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



济南市槐荫区槐荫广场（济南纬八路刑场旧址）“四五”烈士纪念碑